最後，回到我看此書的本來目的，就是期待可以對中日關係史的出路找到一些啓發。我承認這個動機不一定正確，對本書可能要求過高。我看畢全書後仍無法找出其標題所提示的「嶄新視角」，這令人有點失望。本書的不足之處其實正是開拓中日關係史嶄新視角時必須改善的地方：第一，過分集中清末民初及明治這段時期的歷史，對古代及當代的研究不足；第二，過分注重思想文化交流史，對社經、法政、考古及流行文化等領域缺乏組織性的研究；第三，重視史料陳述，分析單薄。長於發掘新材料，拙於作綜合分析；第四，抱有地區主義，未能打通中、日及歐美的學術互動及利用各地的研究成果。

關西大學的中日關係史研究已漸具規模，發展一日千里，期待它能爲中日關係史的未來開拓嶄新視角，這也是我們從事這專業同仁共同努力的目標。

《「滿洲」の成立：森林の消盡と近代空間の形成》，安富步、深尾葉子編，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二〇〇九年。ix＋五五六頁。

林志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回顧二十世紀風雲變幻之政局，「滿洲」始終是一處爲人矚目的地域，曾經扮演過決定性的角色。一九〇五年，當日俄兩國發生戰爭之際，滿洲首次登上國際版面，開始吸引世界各國的目光，此後數十年間，東亞一連串的「事件」便與這塊地理區域緊密相連。譬如「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滿洲問題頓時成爲導火線，正式開啓了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地區的序曲；而終戰後國共雙方發生內戰，該地區也形同兵家必爭的主戰場之一。除了滿洲本身蘊含豐富的礦藏和原料，吸引了將近一世紀以來的移民人口外，如果再加上外國勢力的介入、歷史定位等諸項問題，可以顯見滿洲內部爭端，在在牽動東亞局勢之糾葛。直到今天，滿洲依然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所在。

這本由安富步與深尾葉子合編的論文集《「滿洲」の成立》，正說明研究熱潮方興未艾。該書是日本學界的新近成果，緣起於山本有造教授組織的「『滿洲國』研究會」，匯集了一群長期以來熱切於滿洲歷史的學者，以全新的視野共同參與撰寫，檢討滿洲地區在近代史上的特殊性。不同於以往，政治課題並非全書最主要的關懷；就連經濟和社會的角度，本書其實也希冀突破既有的窠臼，與過去的理解迴異。整體看來，書中內容涵蓋了有關生態、人口、宗教、疾病、貿

易、廟會等各面向，且以比較分析的方式，釐清滿洲在近代中國舞台上扮演的角色。

全書除序章和終章外，分爲四部分，共十三章。細究書內各章所述，可以確知主要的脈絡有三：第一、滿洲何以成爲獨特的地理區域？其次是站在中國基層社會的立場，看待滿洲所具備的獨特理由爲何？最後，從現有的中國社會觀察和理論研究中，滿洲當地是否可以得到印證，抑或有所修正？

第一部題爲「『切開』叢林的鐵路」，探析的是十九世紀鐵路興築之後，如何徹底改變了滿洲的面貌和歷史命運。衆所周知，滿洲原來係滿族祖先的發源地，在入主中國征服漢人進行統治的最初，該地一直都被官方刻意保護，始終堅守「封禁」政策。直到十九世紀的中晚期，受到西力衝擊與影響所致，此一「國策」逐步瀕臨瓦解之境。首先是一八六〇年，遼寧省營口市的開港通商，造成大量移民因此遷入，象徵著此後變動的開端（頁 22）。接著俄、日兩國假科學之名以行侵略之實，分別在滿洲各地進行大規模的森林考察；幾乎就在同一時間，基於維護利權的需要，清政府也以發展經濟爲由，開始介入和競逐於調查活動。於是乎，一系列的調查和開發，進而掀起了滿洲資源和地位的爭奪。

鐵路鋪設的過程，不獨改變了滿洲命運，也促使東北地貌產生偌大的變化。最顯而易見的，是大量來自華北、山東的移民，進入當地後紛紛座落至鐵路兩旁的城鎮，加速地方的建設與發展。長春和哈爾濱兩大城市即爲當中受惠於鐵路建設而飛快成長的代表（頁 87）。至於那些無法經由鐵路深入到各地的城鎮，倚靠的則是完整的馬車運輸系統。本書的第三章嘗試指出：馬車之獲得所以能夠匱乏無虞，可說來自兩方面地利的優勢。一方面，由於長白山森林具有茂密且豐富的木材原料，可以製造馬車，另一方面則是西鄰的蒙古高原，畜養並提供了馬隻。在此雙重有利的條件驅使之下，進而得以形成滿洲特殊的馬車運輸系統和環境。

當然，天下事往往利弊相生。本書的第四章即以土撥鼠爲例，分析經濟貿易背後不得不承擔的風險——鼠疫。由於歐洲市場對毛皮油脂的需求漸增，「滿蒙」地區的土撥鼠提供大量原料，從二十世紀起日益成爲世界市場重要的捕獲區。但隨之而來的數十年間，當地關於鼠疫一類傳染病頻傳，無論自清末的伍連德 (1879-1960)，乃至「滿洲國」時代，防疫活動均係該地不容或缺的「文明」衛生政策之一。這場「文明」疫情如同昔日蒙古帝國擴張領土或歐洲人越洋探險一樣，透過鐵路運輸以及華北、山東的移民人口，還傳入關內，造成大流行。

本書第二部「條條道路通縣城」，以「縣城經濟」做爲概念，詮釋滿洲所具備的獨特性質。可以看得出來，編者安富步對此一主張最力，因爲三篇文章皆出自其筆下。安富步有一基本的研究前提，是針對美國學者施堅雅 (G. William Skinner, 1923-2008) 的看法進行修正。施堅雅結合德國學者瓦爾特．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 1893-1969) 的中地理論，將中國的地域分爲中心地與地區系統兩個層面，以經濟面做爲中心地的基礎。簡單地說，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經濟職能上的區別，中國的市集活動劃分爲不同級別，並且中心地的級別各自形成了相對應的地區系統。在這些地區系統之中，施堅雅提出了核心—邊緣的結構理論。換言之，在各個地區系統中，不同級別的地方政府，所承擔的社會管理職責也各有差異。如此一來，官僚系統和組織主要集中在中心地區，至於地區系統則成爲非正式政治和次文化群。然而，在本書立場看來，滿洲其實有其特殊性，絕非完全適用於施堅雅的理論。書中指稱：滿洲主要乃透過縣級城鎮爲中心集散地，農村流通和市場圈都以縣城爲依據。尤其是北滿和中滿地區，更無施堅雅所預言的定期市場存在（頁 179-181）。除了鐵路的因素外，馬車的輸送、嚴寒冬季下帶來的食物結凍保鮮、大豆物資流通所具備的季節特性等等（頁 181-189），均造就出滿洲獨特而優越環境，也強化了縣城的政治與經濟地位。

第六章〈縣流通券〉則進一步深化「縣城經濟」的討論，特別是有關政治及經濟面。相較於黑田明伸提出的「支拂協同體」論點[5]，本書認爲實際層面的貨幣流通機構和方式，或許更能有效地解釋滿洲經濟特殊的運作情形（頁 236-239）。所謂「縣流通券」，係指縣內的實力商人、商會，在官方允許的情況下，發行通用紙幣。該貨幣之使用，既是結合商界的力量和象徵所在，又充分得自政治實體的支持，形成有別於華北的政治與經濟生態。根據書中指稱，無論軍閥時期還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的滿洲，發行「縣流通券」始終爲當權者做爲有效鞏固和確保統治基礎的手段。

同樣在宗教廟會的活動方面，滿洲情況亦有其不同之處。第七章環繞在廟會的主題上來談。儘管滿洲地區的廟會祭祀活動，大致與關內情形雷同，可是本書以諸多調查報告書的內容發現：交通要道仍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這是因爲多

[5] 黑田明伸：〈二〇世紀初期太原縣にみる地域經濟の原基〉，《東洋史研究》第 54 卷第 4 號（1996 年 3 月），頁 117-123。據黑田氏稱，「支拂協同體」係指商號以農產品集散爲空間基礎所形成的經營模式，有別於國家型態的地域經濟。它建立在幾項基礎和特色上：一、因應季節的不同，結合以商品爲貨幣形式來流通；二、商號之間彼此的信用，至爲重要；三、錢票的發行與傳遞功能。

數農民的生活起居，大多還是集中在鐵路、馬車運輸道路附近城鎮，深受社會機能所影響。例如，娘娘廟原是廣布在北方的一種道教信仰，在基層社會中相當普遍流行，信衆甚多[6]；書中特別以大石橋迷鎮山的娘娘廟爲例，分析此一「典型的鐵道廟會」。根據「滿洲國」時期大量保存下來的資料，日、滿官方都積極介入參與娘娘廟會的活動，富有濃厚的官方色彩。相對來說，缺乏交通優勢之村屯以下層級的廟會，則顯得相當不振，且廟會本身的市場機能也相當有限。總之，定期市集與廟會之關係，在滿洲所呈現的風貌，可謂全然與鄰近的華北迥異。

接著第三部「新權力結構的形成」，分別以：一、滿洲的大豆；二、張作霖對地方政權掌握的過程；三、奉天商會發展等，討論滿洲的政治與經濟權力網絡。第八章〈做爲國際商品的滿洲大豆〉指出：大豆成爲重要的經濟商品，始於清代乾隆時期，可是直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隨著滿洲地位日趨重要，躍上國際舞臺而備受矚目。因此在市場的需求呼聲之下，大豆的種植和生產於是變成掌握權力很重要的一項來源。第九章的內容係以營口市的「西義順」商號爲例，探討地方政權的變遷。該商號本爲晚清民初時期東北一家知名的企業，一九一八年時由於投資失誤，造成營業虧空。爲求維護金融穩定，奉天的張作霖因此介入「西義順」來處理善後，主導償還債務事宜。這一場由實力派所支配的戲碼，進一步更以「維持治安」爲由，完成地方掌控，同時強化了張作霖個人的勢力。另一個類似的實例則是奉天總商會。第十章提及該會也是在政治主導情形下，逐步邁入官商化的過程：在最初的階段，傳統的票莊、錢莊做爲主要通貨標準；接著第二階段奉天官銀號成爲正式金融機關；第三階段則是在張作霖所領導下的企業經營；最後爲一九二〇年代官商合併企業投資與輕工業時代。

第四部分「比較的觀點」，著重於再次檢討施堅雅的中地理論，還有提出對中國農村共同體與市場的看法。誠如前述，爲了凸顯滿洲的獨特性，書中還強調過去日本學界誤解了中國農村社會和市場結構的關係。例如，在第十二章〈施堅雅定期市論的再檢討〉中「附論」裏，著重分析中文語彙「農村」、「農民」所代表的眞正意涵，認爲與其使用這兩個名詞，不如改用「鄉村」、「村人」，更能貼近實際的社會情況。因爲中國農村裏具備「農民」的身分條件，未必純以農家勞動力爲依準，當中情況可能要複雜許多。如書中舉引山西鄉紳劉大鵬 (1857-1942) 爲例，既經營農地，也充任地方文教、炭礦等事業，絕非純粹的單一型態和模式。因爲農村基層生活的面貌複雜多樣，反觀施堅雅理論內容，就顯

[6] 井岡咀芳：《中國北方習俗考》（臺北：古亭書屋，1975 年），頁 396-418。

得站不住腳，亟待修正之處甚多。

至於要強化滿洲經濟發展本身的特殊性，本書則是另闢專章，探討山東農村社會之情形，藉以對照。選擇山東做爲比較對象，其實是深具意義的；因爲除了該省的大量移民和勞動力遷至滿洲外，基本上也是日本人長期活動的勢力範圍，同時還擁有許多相關的調查報告，可供參考。根據這些資料，書中指稱：山東的農村市場網絡，儘管也受到鐵路和經濟作物（如煙草）直接的影響，惟實際上與滿洲的情況卻大不相同。譬如，由於大豆每年收割的時空、氣候等種種因素，促使滿洲幾乎全部依賴生產大豆的輸出，和山東呈現的煙草、棉花、花生等多樣性其實有所不同。如此一來，單一性的農作物迫切需要交通工具，以利經濟運輸，反不若山東多元性通路，足以自給自足，益發顯見鐵路運輸對滿洲地區所具備的意義。換言之，鐵路帶來的影響至鉅，遂使滿洲經濟活動命脈必須更集中在縣城之中來完成才行。由此可知，反思施堅雅的中地論與主張，便會發現滿洲地區環境的特殊之處，尚有難以解釋的不充分地方。

因此，本書的基本想法是：滿洲其實是一處結合市場與共同體混合的地理空間，以「縣城經濟」爲架構下，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所共同建立起來的場域。它的獨特性，既有來自先天的各種限制，但也造就了其中的優勢條件。回想戰前日本在高談滿洲的地位時，經常以「特殊地域」目之，後來則被視作爲侵略鋪路的一套「說辭」；而在戰爭的陰影下，如今人們又不願面對如此「負面」的研究，重新省思這塊地方原來的面目，只是在民族主義中的罪惡和責任間擺盪。本書則爲吾人另闢蹊徑，不斷挖掘和檢視滿洲在近代史上的意義。好書值得主動地閱讀，特別是那些能夠啓發讀者的好書。相信集衆之力完成的《「滿洲」の成立》，正是值得細細品嚐和思索的一本。

《「日本」への問いをめぐる鬪爭：京都學派と原理日本社》，植村和秀著，東京：柏書房，二〇〇七年。二九七頁。

廖欽彬，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